

青春阅读

外国文学名著系列

一生

Une Vie

著者 / [法] 莫泊桑

译者 / 林秀清

复旦大学教授

林秀清 翻译

VOYAGE
READING



江苏出版社

青春阅读

1089269

外国文学名著系列

一生

Une Vie

著者/[法]莫泊桑

译者/林秀清



漓江出版社

— 生

作者◎[法]莫泊桑著 林秀清译

责任编辑◎金龙格

封面设计◎罗云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广西南宁华侨印刷厂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339 千字

印张◎8.75

版次◎2003 年 10 月第 2 版

印次◎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书号◎ISBN 7-5407-1761-0/I·1132

定价◎13.00 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莫泊桑

《一生》原版序言



比尔·科涅尼

“《一生》发表时，那些伟大的能说会道的评论界常常试图破坏一部杰出的作品，他们没有找到足够的充满冷酷之情的字眼来大声说，我的这部小说不真实，故事情节不可能属实。事实上，我的这部小说里所叙述的事情，不久前在枫丹白露那地方确实发生过。关于这事情，我现在有印刷品摆在书案上。”

根据莫泊桑的随身仆人弗朗索瓦所述^①，虽然这部小说成功了，但莫泊桑难免受到对他的头一部小说的接受态度的影响。这种接受态度，爱德蒙·德·龚古尔在他的《文学生涯日记》（1883年4月）中有点喜滋滋地记述：“有人在谈论莫泊桑的那本小说，它不过得到那些喜欢闲逛巴黎林荫大道的那些通俗人士的十分有限的支持，而他却拼命地巴结这些人的口味。”

与莫泊桑同时代的人似乎并没有体会到这部作品的重要性，他们看见的只是一位他们喜欢的短篇小说作家写的头一部比较长的小说而已。就我所知，没有人意识到出现的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是按照福楼拜的创作路线构思和撰写的，但根据莫泊桑本人的意愿，这部作品是处于任何“流派”之外的。

① 见弗朗索瓦《回忆居伊·德·莫泊桑》，巴隆出版社1911年版。

单是小说的标题就足以使人感到奇怪，它巧妙地缺少想象和显得抽象。这位年轻的小说作者甚至拒绝轻易地加上一个形容词，像福楼拜在《纯朴的心》或塞阿尔在《美好的日子》里那样，这意味着莫泊桑有意进到一种绝对朴素的境地，不是故意在做文章。从卷首题词“真实，平凡的真实……”到最后的一行句子：“您看，人生从来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好，也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坏。”一个使女说出的这个结论，小说中的一切都包括在内，叙述本身也就在让娜对爱情的觉醒的年头到她衰老的年头之间的限制中结束了。小说的结构和人生的结构一样，这就是说，它如同一个人的一生，它有兴衰起伏、由果溯因的一致性，如同它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实际上是整理出一个拼图游戏。安德烈·维阿勒在他的论文《〈一生〉——居伊·德·莫泊桑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产生》^①中已着重指出了这一点。同样地，人生从出生到死亡，其主线只是当最后的话已说出时，才带有某种肯定性显现出来。在此之前，一切只不过是推测罢了。

但这部气派如此均匀统一的小说，在寻找到最后的这个形式之前，使莫泊桑费了极大的劲。根据安德烈·维阿勒的看法，这是莫泊桑唯一的一本可以寻找到其准确的创作过程的书。1877年12月10日，小说只处于提纲阶段，正如莫泊桑给福楼拜和给他的母亲萝尔·德·莫泊桑的几封信中所提到的那样。他至少是从这时起工作到1878年盛夏的。他本希望到冬天写完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他停下了两年，只是到1881年才重新继续写下去。奇怪的是，从这时候起，他除了汇编文集出版外，还发表了一些像是这部小说的某一部分的草稿的短篇小说：《春夜》（1881年5月7日），《牧童的冒险行动》（1883年5月26日），《旧物》（1882年5月29日），《相逢》（1882年5月26日），还有在这部

① 这篇文章1954年发表于《纯文学》杂志。





长篇小说之后写出的《平凡的悲剧》(1883年10月2日)。龚古尔提出,他曾看到一本新出的《一生》在奥狄翁陈列廊的橱窗中摆着,是献给布莱纳夫人的,时间是1883年4月10日。

莫泊桑大部分的手稿均已散失,我们目前只掌握一些零碎的手稿,这些手稿是安德烈·维阿勒寻找出来再加以编目的。

经过耐心细致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些手稿是在距离相当长的时间中写下的。有某一人物,最初已有伏笔写到的,后来却消失了;另一个人物,原本只是作为次要人物,后来却突出而且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有的整页的描写被删掉了,但是在最后定稿时,一点也看不出当时下笔时的踌躇不决和中断之处,这些都是为了使那日常生活的描述更紧贴小说的主题,这些日常生活也不过是由一些偶然发生的事情集成的。莫泊桑不是采用画家的技巧,而是更喜欢制作镶嵌细工的技巧。但全篇小说具有支配地位的联结一致性是历历在目的,这联结一致性是由一连串的关键句子来保证其存在的,这种句子是很容易指出来的。

随着小说向前发展,里程碑越来越远,这样就为事件让出了地方来(例如发现萝莎丽和于连两人并头睡在一个枕头上,于连再次的的不忠和他的死亡),然后在没有事件的情况下,出现更重要的叙述,那就是希望破灭时的苦涩的咀嚼。“直至7月末,再没有发生什么新鲜的事了。”(见第八章)

这种“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只不过是重复前头的一些指示,它是与虚无的内在逻辑相呼应的,这种逻辑是和莫泊桑的看法一致的。事实上,在事件的规划方案中,从第八章起,差不多所有的事件都发生了,但全都是起后定性作用的。让娜可能这样想:她的婚姻的不幸,已使她尝尽一切可能发生的痛苦了,但她还得忍受母亲之死的打击,接着是于连之死,这时她为生第二个孩子(这孩子也活不成)与于连已恢复夫妻关系了,然后又是她父亲的去世,但她达到绝望的地步,是她的儿子抛弃了她,使她知道



了人的命运最后只是孤单寂寞。让娜的悲剧是由于梦想与现实的脱节，而不在于她所遭遇的一切，在莫泊桑这样一个悲观主义者看来，这一切遭遇属正常情况。莫泊桑在第一章中着重给我们两次提到让娜在梦想；在第三章中，梦想这个动词不再出现，但这次讲的是所有的女人爱梦想，因此就有些把让娜留在了暗处，或者更明确地说，就是把她与一批女人分开了：女人们爱梦想，但没有对男人的形象——例如于连的形象——过分地重视，她们清楚看到这不过是梦而已，但让娜却不同——我们知道她已爱上于连了——她自以为梦想不久就会变成现实。

在第四章中，还提到“梦想的幸福”，但这正好是在一个疑问提出之前，这疑问几乎是一个预兆，而且它将在第六章中成为“她的梦想的破灭”。

这些同样的征候就像对命运预先的一种说明，因而也是对偶然机遇的否定。我倾向于把它看成是哲理多于小说家的一种技巧。让娜由于少女时代充满幻想，必然导致遭遇不幸，但她并没有愚蠢到只知想象“幸福”，她出于本能，知道它并不存在，但她要求种种幸福的生活，这里两者是有区别的。当“幸福”这个词是单数时，是为了削减其范围，加以限制，几乎把它否定：把它看做“像是幸福的微息那样的东西”。

整部小说的结构建立在幸福的否定上。要是我们细看各章的平衡，我们可以看到全书十四章中有十一章比较长（平装本印刷占大约十九至三十四页），其中有三章比较短（占九至十五页）。最长的几章，如第七章（占三十页）、第九章（占三十四页）、第十章（占三十页），这些较长的几章都与那些标志着让娜陷入痛苦之中的叙述有关（例如于连与萝莎丽之间的恋情，小母亲的去世，于连之死）。较短的三章是展示即将来临的幸福，有属现在的也有属过去的：第二章的结尾是宣告订婚；第八章是叙述保尔的诞生；第十三章中有经常为人所引用的著名片断，它描述让娜



在杨树山庄的阁楼上看到旧日的家具和物品时，激起的几乎是幸福的感情。

同样的文字的节约可以在这部小说的年表里看到，除了幸福的时刻是极为细致明确的叙述之外，其他在日常现实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时刻的叙述，则在含糊中拉伸拖长或散成丝缕。一切都好像让娜在她的纪念册上抓住飞逝的时光，按照其短暂性而估计其价值。1819年5月2日，让娜从修道院里出来。不到两个月，7月1日左右，于连向她求婚，婚期决定在8月15日。新婚夫妇在8月19日动身赴科西嘉，20日到达；23日他们俩住在一个“藏在蓝色海湾处的小城中”；24日他们俩到比阿纳；25日到埃维萨，在那里让娜体验到爱情的初夜；10月15日他们俩在马赛登岸。他们在巴黎逗留了几天，在那里让娜发现于连性格中某些不让人喜欢的特点。10月15日左右，他们俩回到杨树山庄。我们只知道那年的秋天毫无乐趣，让娜开始面临的将是她的一生的危险情况：“这一天和前一天一个样，在不知不觉中度过去了，所不同的是寒冷取代了潮湿。一个星期里的其余几天和这两天并没有什么不同，一个月中每个星期的日子也和第一个星期一个样。”这里表现出某种含糊其辞的技巧，随着让娜深入日常生活之中，“期待”已变为平淡无奇或是更加糟糕，我们可以再次见到这种技巧的运用。

1820年1月9日，男爵和男爵夫人离开杨树山庄，这日期十分重要，因为它标志着让娜厌烦地面对于连的开始。几个星期后，于连和萝莎丽的私生子出世了。7月，保尔早产生，8月末他受洗礼。12月，于连和他的妻子拜访福尔维勒夫妇，这又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这是产生悲剧根源的交往的开始。但是，倘若没有这些新的交往，1821年的头一个季度的生活会是特别单调的。这一年的春天提早到来，而且异常暖和。5月7日，让娜发现于连与姬勒蓓特·德·福尔维勒私通并欺骗了她。5

月20日男爵和母亲到杨树山庄，男爵夫人在5月末或6月初去世。9月末，比科到杨树山庄来介绍他的继位者托勒比亚克神甫，比科神甫具有乡下人的笨拙但能诸事容忍，他很像《包法利夫人》中那位旁尔尼西安神甫，而托勒比亚克神甫的强硬固执对后来一系列事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1822年春，发生了于连与姬勒蓓特身亡之事和让娜早产下一个死胎，病了很长时间。

从这时起，没有什么突出的事件足以成为值得记述的日子，我们只知道保尔在1823年生了一次病，“于是开始一连串单调而苦涩的日子”。1830年，保尔一直像没有文化的小野人一般长大。1832年，托勒比亚克神甫拒绝接受他进入教理问答班学习。1835年，保尔进入勒阿弗尔中学读书。1840年，他终于读到高中三年级。1841年，他和一个女子逃跑，离开了家庭。他的放荡行为终于使让娜变为一位老妇（刚到四十岁），变为只有半条命的人，只能回忆旧事和徒劳地等待。她的父亲死于保尔离家的那一年，莉松姨妈三年后也去世了。莉松姨妈去世后，萝莎丽回来服侍让娜，在她的劝告下，让娜不得不卖掉杨树山庄。这些事都是在1844年发生的。从1846年起，她进入非存在的阴影中：“对于后来的年代，在她记忆中就像隔着一层云雾。岁月交错，模糊不清，她有时花了无数的时间，在日历前面低着头，用尽心思追忆往事，但是连某一件事是否发生在日历的哪一年中也想不起来。”

倘若没有生下几天的保尔的女儿来到巴特镇那所让娜在卖掉杨树山庄后买的房子，小说本身会达到完全结束的境地，正如让娜使自己与外界隔绝，孤守在她自己的小天地之中一样。从许多的细节中，我们知道故事情节发生在诺曼底，而像鲁昂和勒阿弗尔这些地名，都是以真名出现的（但杨树山庄和巴特镇都不是如此），但没有什么足以使人感到，在让娜身外有一个外在的世界存在。我们试图建立的时间编序，完全是让娜的时间编序，她似



乎完全忽略了那些与她无关的事。在1819年5月2日到至少是1850年之间，法国出现过三个国王和一个后来变为皇帝的总统，出现过三种政制、两次革命和一次政变，但没有任何影响到达杨树山庄……同样，整个社会缩小到了让娜周围，一切事情的发生都好像时间和空间是与她紧密相联的，一切都是与她有关的，随着她而变化的。我们有道理对小说的背景感兴趣，我们会记起莫泊桑又回到诺曼底，把它视为启迪他创作的土地。虽然如此，但我们仍然可以考虑，为什么《一生》的两个半制成品，其中发表于1882年5月26日的《相逢》的背景地点是毛尔丛山，而另一篇于1883年10月2日发表的《平凡的悲剧》的背景地点却是奥维涅。还有，为什么有关莉松姨妈故事的一个初稿《春夜》没有指示出地点，《夜间守灵》也是如此，这个故事写的是让娜在念她母亲的旧信中发现她的母亲曾有过一个情夫。我们提出这些意见目的无他，只是要说明在《一生》中地点的明确不如在莫泊桑其他的许多小说中那么重要。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因为，事实上并非出于偶然，在那几篇短篇小说中分散的事件，在《一生》中都是集中在诺曼底发生的，这些短篇中有两篇主要初稿《牧童的冒险行动》和《旧物》，都是以诺曼底为背景的。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要是我们想起这是莫泊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故事情节不足的情况下，他多多少少描述了精神心理状态，莫泊桑难以想象——至少在1878年时是如此——他怎样离开诺曼底这个背景而保持故事的真实性。诺曼底一直是福楼拜写作的故土，莫泊桑是紧紧跟随他至此的。安德烈·维阿勒曾写道：“《一生》明显地把《纯朴的心》和《情感教育》两者的程式和笔调组合起来，但是《一生》排除了考虑历史背景，而只限于写个人的因素。”在1881年和1882年，莫泊桑可能被地中海和奥维涅群山所吸引，这就是为什么《相逢》和《平凡的悲剧》中的背景改变了。突出的一点是，让娜的一生也可以是在别的地方度过的，

因为这里写的是一生……它和其他的一生一样，标志着它的只是一连串经常发生的苦难。

从让娜与社会的关系来看，这个社会并非分为等级，但她却是社会的产物和牺牲品。不过，这个社会也并不特别地属于诺曼底，只能说它具有外省的结构，有点不同，它与巴黎的社会结构相反。像在所有的社会中一样，动力就是利益的观念——利益在这里是取其最普通的意义的，但其流通的线路是封闭性的经济，几乎可以说是属于微型的封建制度。它表现两种权力的概念，一种是佩尔蒂伊·德·沃男爵的那种宽厚的管理以及灾难的财政，一种是于连的暴怒的斤斤计较的管理方式，其结果收效甚微。男爵承袭了18世纪的贵族传统，但同时也继承了伏尔泰的反教权主义和卢梭对大自然的爱，他代表正在消亡的一种文化。于连会很高兴地跟随基佐^①的那句有名的箴言：“快发财致富！”但于连才智不足，他只能是想办法刮抽屉底的零碎的钱。正如我们已提及的让娜的命运那样，这个社会是陷于静止不动中的。男爵随随便便盲目地用钱，而他的女婿却过度地玩弄女人：各自有一套“保持自己身份”的方式。母亲在有一位情夫的同时跟随她的阶级传统；萝莎丽与跟随她自己的阶级传统，献身于主人。保尔步父亲的后尘，最后整个圈子在让娜四周合了起来，她是接受了她那时代少女的消极性的良好教育的人，虽然她表面上与同等级的人无异，她是唯一试图与既成社会秩序作斗争的人。她勇敢地摇撼社会保守的观念，在萝莎丽分娩后为她辩护。虽然当时她不知道孩子在于连的，但她奋起反抗在同样的情况下社会普遍接受的做法。她说：“她是我的同奶姐妹，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她做错了事，那是她活该，但是我决不能因此就把她赶出去。如果必要的话，由我来养这个孩子就是了。”于连大怒起来说：“那样我们

① 弗朗索瓦·基佐（1787—1874），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就要有好名声了，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的门第以及和我们有来往的人！人家会到处说我们包庇罪行、收容贱货，以后有名望的人都不敢上我们的门来了。你到底是怎样想的？我看你是疯了！”几天之后，当让娜知道全部实情时，她厌恶和羞愧得跳起来，但她原谅了这件事，诚实地想起她自己也像萝莎丽所说的，曾经觉得于连“很可爱”。在这原谅之中，让娜表现出一种伟大的理性，这与她的父母和她的丈夫所采取的轻率态度完全不同，他们那些人只希望“一切能好好解决”，不会有什么来打扰这一小圈子抱着心照不宣的传统习惯的人。在丈夫与女仆之间，让娜选择了女仆。

让娜对宗教的态度也同样具有启示性。在这方面，她无疑是继承了父亲的想法。一个良好的家庭妇女敢于退出教会，为老百姓作出榜样，这种事情是罕见的。在她那个时代中，男人常是自由思想者，而女人即使不是信奉宗教者也是遵守教规的人。当那个狂热的托勒比亚克神甫接任善良的比科神甫时，让娜决心这样做了，因为她认为应当提倡态度与思想一致，莫泊桑在这一点上比福楼拜走得更远。在《包法利夫人》中，神甫旁尔尼西安只不过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平庸的人，是药剂师何梅很好的陪衬物，他幼稚可笑但不会伤人，他所犯的轻微的罪过是喜欢做恶劣的文字游戏。福楼拜把他写成为一个和平但可笑的值得同情的人物，提出了一种想法：宗教不成为一个问题。它只不过是爱玛的浪漫主义的化身，是在青春时期的假神秘者爱玛和在两次奸情中的幻觉者爱玛的化身。旁尔尼西安神甫只是在愚蠢时才具危险性，当他误解来向他请教的爱玛的目的时，他没有带给她所期待的帮忙，反而加速了她的死亡。像福楼拜大部分的人物一样，这位神甫是从消极方面来处理的。莫泊桑却正相反，他在《一生》中从相反的角度来处理两个神甫，从而触及宗教的问题。比科神甫和旁尔尼西安神甫有许多方面相同，但比科神甫有办法生存而且活得更好

些。他作为庄园的客人，遵守他所隶属的社会的传统，在推进让娜的婚事上却犯了错误。他以为既然两个年轻人的社会地位相等，他们必然彼此合适，只会幸福，他看不到人间的幸福与宗教不能并存。但他却能根据一些人世的道理，在第一次发现奸情后，调解让娜和她丈夫之间的关系，免得萝莎丽遭受未婚就养孩子之耻辱，到处被人驱逐，成为缺少仁慈之心的乡村里的人嘲弄的对象。比科神甫既非神学家也非知识分子：他相信上帝对他所创造的人类是不可能怀恨的。他的见解颇为有限，但也具有宗教改革的意义。正如让娜的态度一样，托勒比亚克神甫反对自然，仇恨肉体，存心要折磨它：对他来说，宗教成为扰乱和死亡的武器。在《牧童的冒险行动》中，和他相似的一位乡村神甫负责处死了两个情人。这种教士的面目可憎，但教士仍然是社会制度形式的支柱，莫泊桑对这种社会制度是采取反抗态度的。但他对宗教问题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似乎并不走得很远，他的所作所为使人想到他所做的一切，针对了打击宗教却没有针对宗教所代表的一种权力而使劲，他对宗教本身保持着一种冷漠的态度。托勒比亚克神甫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当他不准保尔和他的同龄的孩子一起参加教理问答班时，他同时把他和他的母亲一起逐出了那个他企图统治的封闭的社会。

这位神甫的思想状态，可以用《牧童的冒险行动》中的那位同行的思想状态来说明。

“有人说，从前这个乡村是被一位严峻而狂暴的教士统治着的。他从修道院出来时就仇恨那些按照自然规律生活而不是按照他的上帝的规律生活的人。他对自己严格到无法改变的程度，对别人也表现在无情的不宽容。特别有一件事使他发怒并厌恶：爱情。要是他生活在城市中，在那些文明人和文雅的人中间，这些人会在感情和柔情的巧妙的面纱后掩藏了‘大自然’推动的粗暴行为，要是他在宽敞雅致的殿堂的阴影中为那些满身香气的有罪



的女人们作忏悔，这些女人所犯的过失似乎由于其堕落的姿态的优雅以及在肉体的接触周围包裹着的理想而减轻其罪。这位神甫也许不会感到面对那些衣衫褴褛的人在壕沟的泥土上或谷仓的干草上不干不净地交配时那种疯狂的反感和过度的愤怒。

“他把这些不懂爱情的人，这些只是像禽兽那样交接在一起的人比做粗俗的人。他恨他们，因为他们的灵魂是粗鄙的，他们只求肮脏的本能得到满足，还有那些年纪大的人也怀着可憎的欢乐谈论这些污秽不堪的享受。”

我们已提到似乎足以说明我们意见的地方。这位神甫的态度符合社会已经过时的一种想法：他相信教士的世俗权力，拒绝给予穷苦的人以人的尊严。甚至灵魂本身的原则也受到损害，因为他的教徒们奇怪地直至灵魂都是庸俗的，他们几乎是没有灵魂的。当我们看到他野蛮、俗人、禽兽这些词连在一起时，对他们这些人的天性就会犹豫不决，甚至与拉·布律依埃^①对农民的看法相去不远了。

在《一生》中，让娜拒绝接受托勒比亚克神甫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在过去似乎一直是不成问题的。她的父亲的社会哲学曾在书中简明扼要地介绍过：“这个出身贵族的人，对1793年所发生的事本能地怀有反感；但他那哲人的气质和所受的开放的教育，使他痛恨暴政，当然，这种痛恨也只限于无关痛痒地发发牢骚而已。”他仍保留着某些贵族阶级的情感，而让娜却由于怀有自然地拒绝等级制度的观念而把这样的阶级感情擦掉了。她的父亲在她身上重新建立起意识形态的同时，接纳了一种社会的方式，我们已看到，这种社会方式是十分接近前一个世纪的哲学的思想方式的。她的母亲，由于对贵族氏谱的贪婪的好奇心，希望能与这社会融合成一体，而于连则希望能往上爬，让娜却只求能

① 拉·布律依埃（1645—1696），法国作家，以其《论性格》一书著名。



生活得像没有阶级存在一样。

她与萝莎丽或拉斯蒂克老爹的意气相投要超越与库特利埃夫妇、勃里塞维勒夫妇或福尔维勒夫妇的关系。但这里并没有什么介入的行动，这只不过是一种迫切的生活的需要，像孩子一般接受那些遇到的小欢乐，一些生活所得的小欢乐。这些小欢乐对让娜是特别有限的，因为生活不轻易提供幸福，哪怕对那些没有什么要求的人也是如此。

要想通过《一生》去探索思想历史或政治见闻，甚至外省的风俗习惯，都是徒劳无功的。我们试图提出一些观点，很可能是受小说原文的局限多于受作者的规定。安德烈·维阿勒是对的，他这样写道：“《一生》不是别的，而是探究一个心灵的十分艰难的历程，从对未来的梦想到丰盛的悲伤的回忆。让娜总是过早或过迟，终于没有得以体验，从来没有处在‘现在式’的时刻中。”

还有能补充一点的是，在同一直线上，《一生》和莫泊桑的大部分小说一样，使我们可以追寻现实主义小说的定义。我们在这里想说的是与自然主义相反的……

像福楼拜一样，莫泊桑总是嘲笑所谓的文学流派，即使他不得不加入《梅塘之夜》这本小说集而且因此出名，他也始终保持着完全独立。《一生》使我们看到他的初期的写作练习和他如何面对小说。当福楼拜已写完他的全部作品，左拉已发表三四部重要的小说，于斯曼已出版了一本散文诗集《香料盆》和一部小说《玛尔特：一个少女的故事》时，莫泊桑还没有写出一行字的小说。但是从1878年起，那一年他首次想到要写《一生》，他一直研究一种美学的观点，十年之后，他在《彼尔与若望》之前写的小说研究中就提出了小说创作的主要规律。当左拉通过他的报刊文章和初期的几部小说建立自然主义的基础时，莫泊桑却在福楼拜的影响和保护下向后退了。他和他的师傅福楼拜一样，拒绝左拉的理论中所包含的介入行动。要是“现实主义”包含着观察



